



學苑出版社

廣陵餘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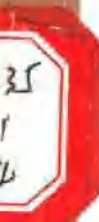
康寧叔夜譙國銓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遊
 志徙焉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士
 庶太僕宗正兼早歲有疾遠羣身長七尺八十
 大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圖
 女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
 又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而修養性服食之事
 之自然非積學所得

牛貴琥 著

埋則安期彭祖之仙

山西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

各卷四羊交刊



广陵余响

——论嵇康之死与魏晋社会风气之演变及文学之关系

牛贵琥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陵余响——论嵇康之死与魏晋社会风气之演变及文学之关系/牛贵琥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7

ISBN 7-80060-181-1

I. 广… II. 牛… III. ①嵇康(225~264) - 人物研究②社会 - 关系 - 文学 - 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825.6②I20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063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印张:890×1240 32开本 10.5印张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04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册

定 价:20.00元

序言

诗云：

自古纷纷说养生，声无哀乐启交争。
世人若怪柳阴锻，终是茫茫雾里行。

叔夜何曾同步兵，有谁识得个中情。
伤心千古《广陵散》，鸣雁嗚嗚气愤盈。

竹林且莫说风流，若个竹林能自由。
阮啸嵇琴宁畅性，此间处处设金钩。

目送归鸿入白云，俊才仙骨自离群。
从来都赏《咏怀》句，几个能言中散文。

嵇康是一位千古伤心的人物，然而千百年来文士们对他的理解和认识更令人感到伤心。当年他临刑东市，顾视日影，演奏完一曲《广陵散》，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时候，海内之士莫不痛之。但是，在其身后文士们所津津乐道的却大多集中在对其懒散粗疏的风度和得道成仙的赞赏、反对或调侃。只要翻一翻他们的文集，诸如以下一类的句子，在有关嵇康的诗文里要

占大多数：

尝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①

珍重列星相借问，嵇康慵病也天真。^②

嵇康傲慢仍耽酒。^③

疏懒无成嵇叔夜。^④

养生吾岂解，懒或似嵇康。^⑤

平生只疏懒，何药疗嵇康。^⑥

身校嵇康今更懒，不曾有与巨源书。^⑦

敢倚嵇康真病懒，不裁书札报公卿。^⑧

①白居易《咏慵》，见《白居易集》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119页。

②李山甫《下第卧疾卢员外召游曲江》，见《全唐诗》卷六四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7365页。

③苏广文《夜归华川因寄幕府》，见《全唐诗》卷七八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8843页。

④戴复古《思归》，见《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2729页。

⑤陆游《小室》，见《剑南诗集校注》卷七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4222页。

⑥杨万里《和仲良春晚即事五首》，见《诚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集部四、别集类三。

⑦王珣《遥送甫草北上二首》，见《尧峰文钞》卷四十七，四库全书本，集部七、别集类六。

⑧叶方蔼《周元亮少参过访兼示新诗画卷率尔奉答》，见《读书斋偶存稿》卷二，四库全书本，集部七、别集类六。

长怕嵇康乏仙骨，与将仙籍再寻看。^①

试共嵇康寻石髓，要随杜老逐金鞍。^②

嵇康兵解洛阳秋。^③

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④

固然嵇康自己讲过“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之类的话，但须知这是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拒绝司马氏之要其出仕，当不得真。要不然《世说新语·容止》言其“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又作何解释？真正“筋弩肉缓”的话，又怎么能柳下锻铁？同理，固然袁宏的《竹林名士传》记过“王烈服食养性，嵇康甚敬信之。随人山，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其半。余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的故事。顾凯之《嵇康赞》也云：“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⑤但

①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见《全唐诗》卷六四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7346页。

②王庭珪《送欧阳广明游仰山兼简慧书记二首》，见《卢溪文集》卷十五，四库全书本，集部四、别集类三。

③袁华《丁未纪事》，见《耕学斋诗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集部六、别集类五。

④苏轼《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写宝积献盖颂佛一偈以赠长老仙公。仙公拊掌笑曰：昨夜梦宝盖飞下，着处辄出火，岂此祥乎？乃作是诗。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见《苏轼诗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1211页。

⑤并见《文选》沈休文《游沈道士馆》、颜延之《五君咏》李善注。

是嵇康不就自己讲过“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吗？如果真是剑解委蜕，又何必临终感叹？

后世文士们对嵇康表现出的这种轻率和轻薄的态度，倒也不能说就是“不敢正视各个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①但的确都是以无视和抹煞嵇康的悲剧性为特征，将表面当本质，以庸俗化的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特出的、不从众的嵇康。如果以“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②来衡量的，的确也符合封建社会文人的特征，其意义已超过了评价嵇康本身。不过也很难这么讲。因为后世的文士中就是正视嵇康之被杀者，所分析出的原因也同样是想当然、庸俗化，与实际有相当的距离。这从他们互相矛盾的论说中就可看得出来。比如黄山谷云：“阮籍刘伶智如海，人间有道作糟丘。酒中无净真三昧，更觉嵇康输一筹。”^③而吴绮却云：“嵇康被忌多因酒”。^④白居易则一会儿讲“都尉身降虏，官刑加子长。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斯人

①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240页。

②鲁迅《准风月谈·吃教》，见《鲁迅全集》第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310页。

③《谢答闻善二兄九绝句》，见《山谷集》卷七，四库全书本，集部三、别集类二。

④《哭友沂》，见《林蕙堂全集》卷十七，四库全书本，集部七、别集类六。

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①一会儿又讲:“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当被戮辱时,奋飞无翅羽。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山林少羈鞅,世路多艰阻。寄谢伐檀人,慎勿嗟穷处。”^②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名教为天下所讳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③叶方蔼则云:“嵇康懒废殊无状,辜负中朝山巨源。”^④刘克庄说:“子元兄弟何为者,自是嵇康处世疏。”^⑤倪瓚则更是认为:“嵇康肆宏放,刑戮固其徵。”^⑥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关嵇康生平行事的资料,在距其被杀不久的时代就不很清晰,并存在着矛盾和异议。对于历史人物的正确理解来自丰富可靠的资料,可是嵇康被杀时已经43岁,与之处于同一时代的陈寿,在其所撰《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中的嵇康传只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寥寥数字。唐人综合各家材料而成的《晋书·嵇康传》,虽然洋洋洒洒二千余字,可是如果去掉所引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和《幽愤诗》,剩下的材料都是从《三国

①《杂感》,见《白居易集》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51页。

②《读史五首》,见《白居易集》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38页。

③《读通鉴论》卷十二,中华书局1996年版,314页。

④《家兄书来言刘吏部公勇将人吴,闻其在梁溪,急具舟访之,已发三日矣。诗以寄之》,见《读书斋偶存稿》卷二,四库全书本,集部七、别集类六。

⑤《少日》,见《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2535页。

⑥《述怀》,见《清闷阁全集》卷一,四库全书本,集部五、别集类四。

志》裴注和《世说新语》等书中抄来的,大多是空洞的描述,将有关传说以“常”、“略”、“尝”、“又”、“后”、“初”一类含糊字眼贯串起来,只能使读者有一大概印象,却很难搞清其身世行年。根据空疏矛盾的材料只能得出同样空疏和矛盾的结论,所以说,从后人对嵇康的评论中当然可以看出各个人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别,但如果从落实到嵇康本人的角度来看,则其本质和将嵇康之死因说成“晋文帝令嵇康北面受诏教宫人,康不肯从,帝杀康于市”^①一类荒唐之言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说的都不合于嵇康的实际情况。

直接制约着嵇康研究继续进展的原因就在于此。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只能是从实际出发来进行工作。关于嵇康,现存最可靠的材料就是他于景元年间被司马昭杀了,并且司马昭随即就“悟而恨焉”,再就是他留下的诗文。那么,通过研究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他的作品,分析嵇康为什么被杀,杀了以后为什么后悔,岂不就能比较正确地把握嵇康的真实面目?丹纳说得好:“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要想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②由作品来看其思想基础,由所处的环境推断其具体情况。我们就可以逐步走进嵇康的精神世界,与其同喜怒同哀乐。起码能够避免理解历史人物所容

^①王世贞《读书后》卷八,四库全书本,见集部六、别集类五。

^②《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32、7页。

易犯的主观性、随意性的毛病。应该说,这是研究嵇康比较正确和可行的一种方法。

事情还不能这么简单地终结。固然艺术家和文学家不是孤立的人,他包括在一个更大的总体之内,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但反过来,所有的单个的艺术家也同时对所处的环境以至于以后的环境起着作用。越是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就越是这样,因为他周围的人们和他会产生趋同性,并形成新的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而且这种趋动力一旦产生,就和任何个人的关系不再密切,社会精神、风气就会按其规律、惯性去运行。就像嵇康临终时的一曲《广陵散》和一声感叹一样,余音一直传向后世,产生回响。关于《广陵散》的种种传说和考辩就是证明。^① 作为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单个人和社会精神永远是互动的,特别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或是两个不同形态的社会相交替的时候更是如此。

嵇康本人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从时代来看,当时正处于曹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争斗的结局已经明朗化、曹魏政权即将为司马氏政权所替代的时期。东汉未被破坏的豪强大族经济已经重新建立并得到巩固和发展。从嵇康本人来讲,他是当时社会上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虽然一般书上都将阮籍定为竹林七贤之首,但这主要是年龄的因素,《世说新语·任诞》就云:“康年少亚之”。正如阮籍的曲折朦胧宜于做

^①参看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附《广陵散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诗,嵇康的锋芒毕露宜于写文论说一样。嵇康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上,而阮籍的影响主要是在表层的行动上。所以嵇康之被杀在社会所引起的波澜要大得多。也可以说嵇康之死是魏晋社会精神、政治策略及各种风习演变之关键。我们不仅要考察嵇康之悲剧和司马氏态度之转变,还要考察这种悲剧和转变对两晋社会风气和文人精神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期的各种表现。这是更深一层的工作。

在世家大族为主体的魏晋时代,清谈也好,文学活动也好,都是世家大族用以表现自我和身份的手段。这个时期的社会精神和社会风气必然地要反映在文学现象上。于是通过竹林文士中文学创作的主体人物嵇康之被杀考察社会风气之转变,就应该与两晋文学特色的形成、文风的改变相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样则有利于搞清中国文学在自觉之后,是怎样在人们所认为的堕落的道路上曲折发展的。两晋文学现象便也能得到较合理的深刻的认识。所以说这个课题实际上是在做两晋文学史。只不过和一般文学史注重作家、作品、流派的介绍不同,本课题可以称作专题文学史,或者说是通过文学反映出来的两晋文士的心灵史。笔者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尝试着去做。相信对认识魏晋社会和两晋文学总会有所裨益。结果如何,就只有请看下文分解了。顺便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常引的《晋书》、《三国志》为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资治通鉴》为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版。《史记》为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世说新语》

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在以后的行文当中只标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作 者

2002 年 12 月于山西大学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嵇康被杀之原因	(1)
第二章 嵇康被杀之后两晋社会风气之转变	(130)
第三章 西晋社会风气与文学之关系	(177)
第四章 东晋社会风气与文学之关系	(222)

第一章 嵇康被杀之原因

一、嵇康被杀的时间

关于嵇康被杀的时间,由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嵇康之传所叙甚简,只有“至景元中,坐事诛”寥寥数字,故自古以来就有着正元二年、景元三年、景元四年等不同的说法。裴松之注云:“臣松之案: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于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毋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与正元相较七八年,以《涛行状》检之,如本传为审。又《钟会传》亦云会做司隶校尉时诛康;会做司隶,景元中也。于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寻文王以景元四年钟、邓平蜀后,始授相国位;若巽为相国掾时陷安,焉得以破毋丘俭年杀嵇、吕?此又于宝之疏谬,自相违伐也。”

裴松之驳正元二年说之误十分明白,但裴氏也没有说出嵇康之被诛是哪一年。不过嵇康之诛是钟会做司隶校尉时,而据《三国志·钟会传》之记载,钟会是景元三年冬,在准备大举图蜀时由司隶校尉转任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的,于是

《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即将嵇康被诛的事件系于景元三年。白珽《湛渊静语》卷二言：“《嵇康传》列于《晋书》，余每疑其误。康死之日实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禅于晋，则康何有于晋哉？”也是基于同一原因。不过系于景元三年也还有问题。因为《晋书·嵇绍传》言：“嵇绍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又言“男年八岁”，此书作于“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①之时，山涛既是景元二年除吏部郎，则嵇康之被诛应在景元四年。如程炎震就云：“《魏志》二十一《嵇康传》注曰：‘案《涛行状》，涛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盖当年即迁，故康书云：‘女年十三，男年八岁’，而景元四年康被诛时，嵇绍十岁也。”^②是以景元四年之说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陆侃如则进一步说：“正如上文所引裴注的话，司马昭于四年十月始授相国位，而吕巽于相国掾任上陷害其弟及康，那当然不能在三年。吕安之狱恐始于四年五月钟会伐蜀之前，故会得进谗于昭。安、康之诛，恐当在十月以后，故巽已为掾了。”^③

其实，嵇康被诛于景元四年是对的，而说是在是年十月以后就有问题了。证据就在于嵇康的《幽愤诗》。诗中言：“噫噫鸣雁，奋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正如吕延济所云：“雁春则北游，故云顺时而动，愤怨曾不俦北也。康见此雁鸣得意忘忧，乃自嗟叹则莫能比之矣。”雁春季北游，

①见《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康别传》，652页。

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652页引。

③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612页。

而嵇康此时正在“对答鄙讯，繫此幽阻。实耻讼免，……神辱志沮。”可知嵇康系狱在雁北飞之春季。《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所引王隐《晋书》曰：“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说明嵇康之人狱至被诛不会时间太久，不可能一直到十月之后。还有，《晋书·文帝纪》景元四年冬十月郑冲之劝进表中云：“迴戈弭节，以麾天下，远无不服，迩无不肃。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海而谢文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文上传》载钟会庭论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以许由一类人的作风作为嵇康的罪状。如果是这时杀的嵇康，郑冲等人能用许由的典故来比况司马昭吗？《三国志·钟会传》云，钟会于讨诸葛诞后“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又云“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①景元四年任司隶校尉者是武陔了。^②司隶校尉既是掌“察举京城官民及附近各郡一切犯法者”，^③嵇康之狱是其本职之事，可知钟会庭论嵇、吕正如本传所云是钟会任司隶校尉之时，而不可能是已上任到关中之后。然而《晋书》既言嵇绍“十岁而孤”，嵇康作于景元二年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又云“男年八岁”，嵇康之诛又不可能是景元三年而是景元四年。所以实

^①《三国志》卷二八，787页。

^②《晋书》卷二，41页。

^③《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3页。

际情况只能是钟会任关中诸军事虽然是景元三年冬,而其正式上任则是第二年春季。钟会之所以被任以督关中诸军事,是由于其为司马昭筹度伐蜀,所以也才能在论嵇康时以“康欲助毋丘俭”^①来使司马昭下了杀嵇康和吕安的决断。嵇康之被诛自然只能是景元四年的春季,并且不可能迟至景元四年五月钟会伐蜀之后。至于陆侃如先生的因司马昭于景元四年十月授相国位,而干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就认为嵇康、吕安之诛是在景元四年十月之后,则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古人一般习惯于以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官职称呼这个人,并不管这人这时尚未担任或已迁转这一职务。就像《资治通鉴》景元三年“康尝诣隐者汲郡孙登”下,胡注云:“晋泰始二年,始分河内为汲郡,史追书也”一样。^②吕巽能为相国掾,就是有宠于司马昭的结果。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这一点。

另外,向秀之人洛也可证明此事。《晋书·向秀传》云:“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不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向秀之人洛只能是景元四

^①《晋书》卷四十九,1373页。

^②事见《资治通鉴》卷七八,2465页。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云:“在称谓上以死者最高官职(或爵号)来代指其姓名,此为古代一般做法。在使用中,往往不严格分辨此官职或爵号得于何时,即使事主晚年所得,甚至死后所赠,亦不妨碍在叙述其任何时期的文字中出现。”《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第7页。